

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:

为古书延续命脉是我毕生的使命担当

漫谈·我与文学

·人物简介·

黄佟佟,资深媒体人、记者,曾为《ELLE》《瑞丽》等杂志撰写人物特稿,获《南都周刊》年度新闻报道大奖等。至今已出版个人著作14部,《春光好》系其首部中短篇小说集。



作家黄佟佟:

我的心里拥有一缕春光

■口述:黄佟佟
■记录:徐荣木

《春光好》是我用20年时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,入选2022“持微火者·女性文学好书榜”年榜,同名短篇小说首发于《上海文学》,被《小说月报》转载。

我出生于湖南湘乡,大学毕业后入职广州一所中学任英语教师兼班主任,任教四年后进入媒体工作。

《春光好》包含小镇、乡村,厂矿、小城,都会、流年三个篇章共19个中短篇小说。故事发生的背景有农村、城市、学校、工厂……小说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隐性线索,穿越三重叙事宇宙。20余位小说人物多以女性为主角,叙述普通人在时代大潮中的绝望挣扎、踌躇得意,侧面展现了湘中地区保守而不失霸蛮,粤港澳大湾区市井又不失灵活的地域特点以及丰富多样的生活况味,呈现了一代中国人的微观社会。

回忆自己的写作经历,要追溯到我的中学时代,彼时,我就做着写小说的梦。每当见到一个有趣的人,或特别可爱,或特别可恨,或严苛的母亲,散淡的父亲,格格不入的同学,张牙舞爪的乡邻,人间百态人事故事等,我便思忖,好记性不如烂笔头,于是随手写下这些故事储存在,打算将来把这些故事写到小说里去。

在广州,我做了10年的《希望》杂志和两三年的《花溪》杂志,后来又去了时代周报和南都周刊做人物采访,再从杂志写作到公众号写作,我开始更多关注城市女性真实鲜活的生命经历。

几十年来,无论我在乡村求学,还是到城市杂志社、媒体谋生,记录生活中故事的习惯,一直保持了下来,现在看来,如果当初我不是即时记下,有一些故事就完全忘记了。

虽然有的记录下来的一些人,我并不喜欢,但是写作时你就要把这个人放在心里,让她活起来,再试着去同情她、拥抱她,成为你笔下的人物,倾注你所有的理解和同情。这些小人物的原型,呈现的是高度浓缩的时代女性生活与命运样态。

我在生活中遇到过的这些人和事,它们常常缠绕着我,拉扯着我的心,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,年龄增大,记忆力减退,我越感觉到,这些故事再不写,就来不及了,是我们选择了它,催促我写出来。

在我写的这一个一个故事中,我将个人的命运融入时代的命运,它就像一扇扇“窗口”,从中可窥见中国社会40年来日新月异之蝶变。而文学是能够帮助一个人在思想领域走上一个更高境界的。

我写的《白桃杜薇》,小说主角杜薇的生活状态非常奇特,命运跌宕起伏,她40岁时,已经不太受人关注了,走下坡路了,我就写她跟这个世界的碰撞、失落。我想通过写一个女人是如何从梦幻当中一层一层地被剥离,被刺痛的,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意思。人啊,面对坎坷命运,得好好活着,下雨了撑伞,天晴了晒太阳,随遇而安,开心过好每一天。

人生苦短,时光匆匆。平时,我习惯列表格,用于监督自己。比如,我今天要做十件事情,做完一件事就在表里打个勾,今天打完了勾了,说明没偷懒,不虚掷光阴,心里踏实,通过一项一项地去做事,自我感觉我还算是一个有用的人,我觉得只有踏实做事,生命才过得充实而有意义。

我心里拥有一缕春光,面对种种困境,我会不停地去找解决方法,在找解决方法的过程中生长出力量,也强大自己。

6月1日至2日,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中国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,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。在召开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前一天,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。在兰台洞库,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小心翼翼地翻开斑驳的文津阁本《九章算术》。纸张泛黄、墨迹隽永,无声讲述着文明星河的赓续。

历史典籍版本记录着中华民族形成、发展、壮大的演进历程,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,在融通古今、保护文脉上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杜泽逊在投身古籍事业的30年里,参加国家的许多重大项目,在古籍整理、保护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。他对古籍充满感情,以下是他的讲述:

■口述:杜泽逊(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)
■记录:吴晨阳(作家)

研究文献要讲实物要鉴定

我是做古籍整理研究的,学术界经常把古籍搜集整理比作地质队的野外勘探,这是一个枯燥的工作,必须要甘于寂寞,不慕繁华,才能深入进去。在我看来,保护古籍好比给书“续命”,“医生救人的命,我们救书的命,是为古书续命”。守护古籍,让中国传统典籍不要失传,让千年文脉得以传承。生命是有限的,只要让典籍不失传,就能把作者的精神留给后人,就相当于续命了。

目前,我们做的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项目——《清人著述总目》的复核工作。为了推进交付进度,学生们在学习之余,每天至少要工作4个小时。我的爱人程远芬也师从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王绍曾先生,从事古籍整理工作,我们两人全年无休,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1点多,基本上都在食堂吃午饭和晚饭。我们的项目组位于学校老楼楼西北角的办公室(最近才搬移至文史楼二楼),大家称这里为“校经处”。项目的工作量很大,需要足够的人手。现在和我一起做项目的都是学生,有本科生,有硕士、博士,也有博士后。

这个项目从2004年9月1日开始,到现在也没做完,还在不断地修改。主要是研究清朝人到底写了哪些书,靠着掌握的目录学知识,我们把书上记载的清朝人著作中的每一部书,每一次记载,都写成一张卡片。这张卡片能告诉读者这部书的书名、卷数、版本,藏在什么地方等信息。这是一个劳动量极大的工程。需要300多人来抄这些卡片,我与300多人一个不落地,教他们怎么抄各自所负责的那本书。他们学会后就开始工作,几天后,他们把完成的工作交过来,然后再布置新的工作。这些做好的卡片,一开始放在我家的床底下和阳台上,有好几吨重,我爱人都担心压塌了房子,砸到楼下的邻居,可见这工作的繁重。

我们申报项目预计要用80万张卡片,但做出卡片的数量远远超出了预期,大约做了124万张卡片。因为经费不足,我和我爱人经常节省支出,用工资垫付费用,先后垫了13万多元。我们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,当时,13万元是一笔巨款。我们想着就是砸锅卖铁,也要把项目干下去,绝对不能停工。我和爱人出于对古籍事业的热爱,一本古籍书的出版,就付出了几十年的光阴。

编纂《山东文献集成》期间,为了调查古籍底本,我几乎跑遍了山东

省内外各大图书馆,在图书馆里查询需要的图书,那段时间,我成了图书馆的“寄生虫”。研究文献要讲实物,要鉴定,同时也要看懂内容。在此期间,我看到了一本已经有250多年寿命的古书,这本书没有提供编者的信息,没有作者落款,写作年代也不详,在此之前从来没有面世过。这本书的边没有切,是非常原始的毛订本,属于普通的竹纸,一般都是清朝的东西。我根据书的内容判断这本书是武定府的人,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惠民县人编写的,编写者说先母字晚芳,名字叫张衍惠,这是很重要的线索。编者又说李贻芸是他的姐姐,知道了这个信息,我们就能查到李贻芸弟弟的信息。一个是李贻良,一个是李贻隽,这两个人中,究竟是哪一位写的呢?我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。后来,我在青岛图书馆,发现了一部《齐燕联唱》,《齐燕联唱》的纸张,装订的方式,书衣大字的题签,和这本书很接近。《齐燕联唱》上面有李贻隽的说明,至此,才解决了这本书作者是谁的问题。

做古籍需要一颗赤诚的匠心

学术研究需要积累,从来没有速成的。但有多少人愿意花费数年的时间,去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?尽管每个项目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但我仍然坚持反复校勘三次以上,争取把错误减少到最低,这样才能保证书的质量。

在做《四库全书存目标注》时,有人曾经好心心地劝我先出一本书,这样就能评上职称,因为职称评定一般以五年内的科研成果为准。但我认为,好高骛远、好大喜功,只能欲速则不达。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,要有牺牲精神。如果急功近利地粗制滥造,就糟蹋了前人这么好的研究成果,还不如不去做。

如果没有远大的目标,就不可能产生重大的科研成果。科研成果的生效一般不会在当年,做科研必须坐得住冷板凳,要有定力,不能单纯去责备评价体系。如果是追名逐利之徒,就会永远走在短平快的路上。我曾经在科研评价中得了几次零分,但从来没有纠结过这件事。我们培植的东西很可能20年后,才能发芽,在前19年都得零分,但到了第20年就会大放异彩。我1999年编写《文献学概要》,直到2021年《文献学概要》荣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一等奖,前后长达22年。

我曾经带领15名学生,完成了《周易注疏》19个版本的校勘,这么大的工程,如果一人做,至少需要15年。

我们的团队,历时6年,抢救出了1375种濒临失传的山东籍著作,编纂了200册、32万页、1亿多字的《山东文献集成》。我们将每一种古书都反复考证,为文献延续了命脉,最终完成《清人著述总目》的工作。这部大书网罗清代著述22.8万种,每一种都附有作者生平和版本信息,在保存清代学术成果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。

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,需要一颗赤诚的匠心。假如我的项目需要30年,我就用30年的时

间,29年都不行。因为有学生,我们可以兵团作战,到65岁博士生导师要退休,那时候,就不能带学生做项目了,我就在家里和程老师一起做,做到不能做的时候为止。

老师的幸福是看到学生成才

2012年7月山东大学决定设立“山东大学古典学术人才培养实验班”,作为古典学术人才培养的校级基地,命名为“尼山学堂”。我作为尼山学堂的班主任,想了很多办法,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,拉近学生和传统文化的距离。

为了让学生更快地成长,我付出了很多。每个学生交给我的论文,我都会仔细地看,用不同颜色的笔写出修改意见。我对他们说:当年王绍曾先生就是这样指导我的,这份用心修改的论文,凝聚了三代人的文化传承,希望你们以后也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,传承不仅是学问的传承,还有感情的传承、人生观的传承。目前尼山学堂已连续招生12届,在国内培养国学专门人才的本科班中居于前列。我是个桥梁,把老一代的东西接过来,担子挑在我们肩上,走了一段时间,再把担子交给下一代,让他们继续挑着往前走。我对尼山学堂的学生寄予了厚望,每届学生入学,我都会跟他们拍一张合影,耐心地和他们学生谈话,了解他们的学术兴趣和日常生活。这样才能因材施教,制定出最适合的培养方案。开得好课程,请得好老师,招得好学生,这是尼山学堂的办学特点。当然,正因为如此,尼山学堂才能拥有“自由的环境、人文的精神、无限的可能”。

我认为,作为一名教师,想要讲好自己的一门课,讲出自己的心得的话,就要花大力气备课。讲课时举出的例子,都是经过筛选留下来的典型例子,首先得保证正确,如果不能保证正确,哪怕再有有趣性,也不能搬到教材里。每条例子,都要进行深入的研究,提起学生们的兴趣,让他们学到东西,学生们自然愿意听课。文献学的期末考试,我允许大家开卷,每年的最后一道大题,都要考学生对文献学这门课的感受,学生们的分值差距就在这道题中体现出来。我上课从来不点名,因为一门课不可能让所有学生都喜欢。如果学生不喜欢听这门课,就不应该强迫他来。让学生有时间去图书馆看看喜欢的书,做感兴趣的学问,这样挺好的。

学问之道,言传身教。研究生培养的目标是让学生具有研究创新能力,那么培养的方法,就应当通过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来进行。研究生在开始的阶段没有掌握研究程序,不会选题,也不会开展研究工作,需要导师的言传身教。

从教40余年来,我对每个学生都付出了心血,从学生毕业,走向社会,我就像送女儿出嫁一样,心里非常不舍。我会把学生们毕业的照片冲洗出来,做成相册放在校经处。没事的时候,就翻开照片看看。我想,老师的幸福是看到学生成才,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后继有人,内心非常欣慰。

人文对话

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真理力量

日前,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5周年,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了《当青春遇见马克思》一书。这本书由知名教授和青年学者共同撰写,从多维度、多视角、多层次阐释了“青春”与马克思的“遇见”和对话,饱含青春气息、具有青春魅力。《当青春遇见马克思》这本书带给我们哪些触动?我们又该如何在现实中践行马克思主义呢……对此,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对话了多位专家,全方位解读《当青春遇见马克思》。

■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亚菲

记者:都说未来是属于青年的,能否介绍一下为什么想到主编《当青春遇见马克思》?

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、《当青春遇见马克思》主编郭建宁:未来属于青年,历史的重任将落在青年身上,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。支持年轻人,扶持年轻人,为青年学者的成长成才提供更多的可能、更广阔的舞台,对我来说是一种责任,也是一种乐趣,何乐而不为。

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、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,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,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,当然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使命担当。

新时代新征程,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,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,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,坚持实事求是,解放思想,守正创新,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、把握时代、引领时代,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“矢”去射新时代中国



之“的”。科学回答中国之问、世界之问、人民之问、时代之问,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,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,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、21世纪马克思主义,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为强大、更具说服力的真理力量。这就是我主编《当青春遇见马克思》使命所在。

记者:马克思、恩格斯在青年时期,他们创造性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,而且经得起100年、200年的考验,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?

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、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》常务副主编刘书林教授:不懈地追求真理的人永远年轻。为什么追求真理要用青年精神?在我看来,青年的特点,它是人生的一种过渡阶段,它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阶段,它是从未成年到成年人的过渡阶段,它是一个发展的阶段,它当然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阶段,怎么对待这一阶段,这就是我们这一生成功与否

或者成功大小的关键的一个思想意识。马克思到今天“活到”200多岁了,但是青年人经常把他拉在身边。他的追求,他的精神,就像青年人一样,他不怕孤独,就像一条船开到山顶上去,没有人说他是错的,但是他在没找到新的证据之前,他就敢这样做。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得有一个不懈的精神,它就是一种意志,而这种意志不经过苦难,不经过克服苦难是得不到的。他们把克服这种困难当作一种乐趣,不断去吃这样的苦头。我从马克思、恩格斯身上看到了这一点。

记者:能否简单介绍一下《当青春遇见马克思》一书的特点?

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、《教学与研究》副主编侯侠社教授:《当青春遇见马克思》是一本集学术性和通俗性、思想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读物。通过六个方面,即文本阅读中的马克思、历史深处的马克思、思想论战中的马克思、科学信仰中的马克思、青年的困惑与马克思以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,这六个方面来整体呈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,呈现了一个全面的、立体的、生动的马克思的形象,呈现了兼具科学性和时代性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象,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未来、马克思与青年密切关系。这本书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穿越时空对话的中介,是因为它力图回答大家耳熟能详的“四个之问”——中国之问、世界之问、人民之问、时代之问,就是以青春的视角、以与马克思对话的形式来回答这些重大问题,意义十分重大。

记者:从这本书中能读出今天的中国青年要学习马克思哪些方面呢?

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、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教授:一是学习马克思为人类理想而奋斗终生的目标。要树立我们的理想目标,把我们的职业当作事业,这是第一

个我觉得应该学习的地方。

二是应该学习马克思既在书房里面读大量的经典著作,读有字之书,同时又走出书房,深入当时的社会,做大量的调查研究,读无字之书,我觉得这一点对于青年学者是有启示意义的,值得我们学习。

三是要学习马克思不断地清理自己的哲学信仰,不断地超越自己的思想。他的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对1843年的思想就有超越,他在1845年创作的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,就清算了他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信仰,他在之后的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又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清算,所以他后来的思想是不断地在批判清算,超越他以前的思想而不断发展的,包括刚才我讲的几个转变,也体现着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不断地超越、不断地与时俱进。

四是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既注重用思想理论研究来建构思想体系,同时也更注重付诸实践,既解释世界,但更多的是为了改变世界。所以马克思既是理论家,也是实践活动家、革命家。马克思参与和指导工人运动,要从实践运动方面来实现他的思想,把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,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五是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敢于斗争、敢于批判的精神。马克思的很多著作书名大都是以批判命名的,有人问马克思,你最擅长哪个方面?马克思讲我最擅长的是斗争,他对自己论题要进行斗争,对资本主义社会要进行批判,具有超越性。所以这种批判精神、斗争精神和我们今天讲的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也是相契合的。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

六是我们要学习马克思胸怀天下的世界眼光。马克思很多思想都是通过研究世界历史提出来的,而且他整个思想都是胸怀天下的,为了解放全人类,解放无产阶级,实现每个自由全面发展,值得青年学习。